

# 浙江文化的价值特性和核心价值观构建

郭维平

(嘉兴学院平湖校区, 浙江嘉兴 314200)

**摘要:**文化具有客观价值性,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与人发展的关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两个维度。浙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在改革开放中充分体现了其价值特性:时代性和历史性相统一,人文传统得到现代转换;现实性和思想性相统一,价值共识得到凝练;主体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经济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基源意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浙江文化具有整合与统领作用,应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浙江文化;价值特性;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5)05-0032-06

“浙江现象”是因浙江显著的发展绩效而出现的新名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作为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与文化大省,经济总量从全国第12位很快跃升到第4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0多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1位,被公认为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各方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浙江持续高速增长现象的背后是什么?生机盎然的发展活力来自哪里?浙江并没有先发的工业化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或资源优势,也没有特殊的国家政策扶持,“浙江现象”的出现不在于物而在于人,是其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在起作用,是浙江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文化因子深深地影响了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形成了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那么,浙江文化有哪些价值特性?与核心价值观建构有怎样的关系?本文拟从文化的价值性视角来进行探讨。

## 一、文化的价值性

### (一)文化的本质

文化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字卷说:“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川事实上,现代社会对文化普遍做出的是狭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自20世纪以来,人们已逐渐倾向于从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并列的角度使用文化概念。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作为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曾作过科学的阐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认识的基本观点。”(心)文化的外延是文化现象,主要有文字、语言、艺术、自然科学技术、经济思想和理论、法律、伦理道德以及宗教信仰、哲学和社会学说、教育、新闻出版等。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文化从源头上说就是人化,即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财富和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成果、精神文明成果等。文化从功能上说就是化人,即教化、内化、提升、丰富人的涵养与素质,使人以人的方式而不是以动物的方式生活着,这是文化最根本的功能。

---

## (二)文化的价值

文化是一种价值现象，具有客观价值性。一般认为，价值是指现实的人(主体)同满足其某种生存或发展需要的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即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某种适用与意义。文化的价值性相应地是指：文化作为客体对于现实的人的文化本性和需求的某种适用与意义，它主要体现在文化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两个维度。

### 1. 文化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对个体而言，文化起着塑造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即“文化化人”，这就是人文价值。人在使外部世界“文化”的同时，也使自己逐步“人化”，与原本“自在的、混沌的、蒙昧的自然状态”相区别，形成“人的状态”“社会的状态”。文化的这种本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尽可能完整的全面的”人生产出来。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教化立人”也是这个意思，使人“生而有礼”，有仁爱之心、道德之心，懂廉耻、知进取，成其为真正的人。这是人之为本性的需求，可见，人文价值是文化的首要价值。特定的文化可以熏陶人、培养人、引导人、改造人，把人身上的野蛮动物本性改造掉，把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思想和习性消除掉，使人有“人性”，并按照一定的方向发展，以符合社会的文明标准和发展状态。

### 2. 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人是群居动物，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以文化之”的人必然产生文化之思维和思想，以人文价值统领、覆盖物质世界，进而就有了文化的思想价值、情感价值、生活价值、民生价值等。其中最核心的是思想价值，表现为价值观念的整合与引导：文化能够融合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思想观念，使之趋于基本一致。因为人具有从众心理，总是力图从所处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所以凡是社会文化及舆论普遍肯定的事物与行为，必然会被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和追求，反之亦然。这就使文化能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发挥目标引领、行为规范、意见整合的作用，进而起到社会整合与导向的作用。一个社会(或是民族、地区)的主导文化有其相对独立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在它长期的熏陶、教化和培育下，整个社会(民族、地区)的思维习惯、情感表达、价值追求、道德信仰也会逐渐趋同，从而聚合成一种群体效果和社会现象，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文化境界，比如浙江精神和浙江现象，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三)文化价值的规律

我们用价值率来描述社会价值增值的速率。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产物，经济的价值效果可以直接度量，政治的价值效果却要通过相关的经济活动来体现。而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产物，政治是经济与文化的中介，所以，文化事物的价值效果要通过相关的政治(或经济)活动来体现，由经济学中“广义价值规律”的推论可得：文化事物的价值率围绕它所影响的政治(或经济)事物的价值率上下波动，当文化事物的价值率大于它所影响的政治(或经济)事物的价值率时，就会促进该事物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该事物的发展。也就是说，文化价值的正负由它所影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而定。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包含了语言、文字、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一切人类的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所以它实际上就是调整与控制所有经济规则和政治规则之规则，虽然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又规范与导引着人的实践活动。这种高层次规则的改变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和制约着社会各种矛盾的现实状态和发展方向，影响着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甚至能间接地改变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因而文化以间接方式创造着财富，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生产领域。尽管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是经济，但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巨大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文化行为相对于经济政治等其他行为而言具有更大的全局性、长期性和高价值层次性等特点。

## 二、浙江文化的价值特性

---

浙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积淀成了独特的浙江精神和文化性格，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体现了其价值。

### (一)浙江传统文化与人文特点

文化传统是对先人的传承与重新选择。浙江人在特有的地理资源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历史背景下，传统文化不断得到传承和扬弃，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特点。

1. 敢闯敢创且刚柔并济的文化性格 浙江总体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为了开辟生存之路，逐渐形成了敢闯敢创的精神，出外谋生者众。浙东相对而言山地多生存环境恶劣，还存留着一些古老百越族悍勇、质朴和大胆进取的心理特征，驻勇坚韧、敢为人先，向外拓展意识强，文化性格偏向“剑”的刚性。浙西是平原和水网居多，交通、农业均较发达，因而这里的民风相对平和，商品经济意识强，经营上精管理、巧安排、善思虑，文化性格偏向“萧”的柔性。绵长的海岸线还使浙江人养成了心胸开阔、敢于闯荡、和衷共济的文化性格。

综合而言，浙江人既有山里人驻勇坚韧、顽强拼搏的硬气，又有滨海人勇于开拓、敢于闯荡的胆气，还有水乡人善于谋划、豁达变通的灵气，可谓是敢闯敢创且刚柔并济。

### 2. 工商为本与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

浙江人一贯重视工商，有长年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浙江已有商船出海贸易，成为全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之一；黄宗羲早在明末就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促进了经商之风，浙江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成了明末清初我国十大商帮中的两大帮。鸦片战争后，温州、宁波、杭州均被开辟为商埠，近代又毗邻大都市上海，加速了经商贸的发展，使浙江人工商为本的意识进一步发展，且在长期经商中养成了精明的商业头脑，养成了诚实守信的群体性格，崇尚义利并举，还形成了强调现实主义、注重经世致用、倡导重视工商的“永嘉事功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而。今日“浙商”成为我国历史上晋商、徽商之后的第一大商帮而享誉中外。

### 3. 崇文厚德包容和善的文化特质

历史上“安史之乱”等引起的三次南迁之潮带来了南北文化的大交流，造成了江南文化的繁荣；另外，1840年后宁波、温州、杭州相继辟为通商口岸，使浙江人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接受他国文化熏陶较早较多。中西方文化孕育了浙江人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使浙江文化繁盛发达，耕读传家，名人辈出，具有崇文重学的文化底蕴。总体而言，浙江文化具有一种向内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和敢为人先的气魄、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 (二)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特性及体现

浙江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源远流长，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一般价值性，还有其价值特性。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气候下，“给点雨露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其文化价值性得到充分体现。

### 1. 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统一——传统文化得到现代转换

优秀传统文化能否超越时空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发展，对文化的价值实现十分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促使浙江传统文化内部范式发生更新，价值因子发生创造性转化，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了现代转换。比如改革开放激活了浙江人敢闯敢创、勇于开拓

的文化精神，转换为排山倒海式的创业激情，“创业了”“下海了”成为浙江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潮流，一个创业者社会开始呈现，千百万浙江人尝试着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使浙江率先启动民营化、市场化改革，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改革开放也激活了浙江人工商为本的文化基因，使之转换为求富图强的社会心理和经商大潮，浙江人很快呈现出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的能力，从全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成就了浙商群体形象的同时，也成就了浙江作为市场大省的经济特色，无处不在的专业市场和务实守信的市场原则成为浙江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发展的沃土。“崇文厚德、包容和善”的传统，现代转型为开放、开明、开通的社会风尚以及和善、和睦、和谐发展的共同体价值，促进了思想开放与文化包容，还使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代代相传，被誉为“浙江好人，德行天下”，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

## 2. 思想性和现实性相统一——人文精神与价值共识得到提炼

如果能将处于混沌、碎片式的人文思想在实践中提升为一种明确的、激励民众的人文精神，必将提高文化本身的价值率。浙江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充分的凝炼和提升，使思想性和现实性得到了统一。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浙江人自发形成了“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发展难题。2009 年，为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在党和政府引导下，浙江人又提出了以创新创业为核心的“新四千精神”，激发出新的活力，引领经济转型。2000 年，浙江精神被概括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16 个字；2006 年，浙江精神被进一步界定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12 个字；2012 年又提炼出社会认同率最高的“务实、守信、崇学、向善”8 个字作为浙江人民共同的价值观。这个过程是以传统文化为基源不断提升浙江人文精神与价值共识的过程，也是浙江经济社会从自发发展到自觉发展的转变过程，更是浙江民众思想境界与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尤其是形成了能凝聚浙江力量的价值共识，使浙江具备了独特的区域人力资源优势，这是一种文化精神与价值观的优势。

## 3. 主体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经济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川根据价值规律，当文化事物的价值率大于它所影响的政治(或经济)事物的价值率时，就会促进该事物的发展。浙江精神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大发展，主观意志与客观结果相统一。1979-2007 年，浙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3.2%，比同期全国平均年增长率 9.8%高出 3.4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2 位；人均 GDP 年均增长 12.1%，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省市中人均 GDP 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制度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浙江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大胆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形成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外商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典型省份。而且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步，浙江的社会发展同样稳步前行，其综合评价指数已居全国第 4 位。浙江一没有特区政策，二没有国家重大项目，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模范典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可见，积极的文化因子深深地影响了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主观愿望变成了客观现实。浙江优秀文化传统是该区域的突出优势，是最深厚的软实力。

# 三、在浙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中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价值观则是文化的核心，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在于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思想的引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重要，但核心价值观不是空中楼阁，在浙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浙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结合。

## (一) 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源意蕴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在历史进程中被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或居于统治地位和主流地位的价值观，也是

该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反映我国社会各种价值观内容的最大公约数，是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凝练、提升、创新而成的，这里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文化血脉和价值传统。深入分析可见，一方面，浙江优秀的传统人文精神与我们党提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极大的同一性。比如前而提到的“敢闯敢创、敢为人先”的文化传统，“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等浙江精神，蕴含的价值目标就是民富国强、文明和谐，与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设目标完全一致；浙江素有追崇科学和平等经商之风，那种“工商为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经世致用”“求真务实”与“开放开通”的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原则完全吻合；浙江人“崇文厚德包容和善”的文化特质，耕读传家、爱国爱家的传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修养之道，“诚实”“守信”“向善”等内在的传统价值因子，与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准则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正因为浙江优秀传统文化与浙江精神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具有高度一致性，所以其中所蕴含的价值目标、价值准则与价值追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来源，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从浙江和各地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因子中提炼、提升而成的。也就是说，浙江优秀文化传统与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建构的文化精神本源之一。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浙江文化传统的整合与引领作用

浙江区域文化在具有先进的特点和优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浙东重血缘、人缘、关系缘的传统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家庭控制企业居多，思想的高度和气度不够，导致产业层次比较低，高尖精产品不够多；浙西“鱼米之乡”相对富裕，民风偏向安逸，容易满足，存在求稳怕乱的守成心态，官本位意识、本土意识都较强，在创业中比较保守，成大业者不算多。这些地域文化的局限性使今天的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新的矛盾与问题，主要是在文化心理上气魄不够大，经济上容易满足于“富、低、小”，导致“标兵渐远、追兵渐近”。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单靠行政命令，也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思想文化观念与价值导向问题，需从根本上加强先进文化的引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文化的整合与统领作用，促进文化观念的改变，提升价值目标与社会心理。作为先进文化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揭示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一体性，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创新的精神，一种民族气魄和共同理想，促使民众心中有大气、有国家、有世界、有境界，视野开阔，锐意创新。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和内容正在或已经影响着浙江民众的思想意识与价值取向，比如富国强民的大局意识，改革创新的品牌意识，平等公正的法治意识，爱国敬业的奉献意识等正在逐渐增强，文化整合正在实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浙江民众统一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形成。

## (三)在浙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浙江的培育和践行必须和浙江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相结合。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解构”与“建构”，不仅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有关，还与自身原有的思想文化观念有关。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图式，根据他的观点，客体只有通过主体结构的加工改造才能被主体所认识，而不同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程度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主体原来的认识图式是怎样的。可见，浙江民众原有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理念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所以我们应大力挖掘浙江人文传统中那些优秀的、积极的因子，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比如勇于创新、开拓进取、谋富图强、讲求实效、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等，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与当下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同时需坚决摒弃原有文化传统中那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比如重血缘重关系，目光短浅、小打小闹、一富就收，满足现状、贪图安逸等，使之没有存在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民众共识。这里文化环境的营造十分重要，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社会心理具有摹仿、趋群性等特性，这种天生的从众心理可称为“意识的趋群性”，这是人们的价值观念能受主导价值影响得以整合的潜在动力。文化既影响人们的直觉和情感，也影响人们的语言与习俗，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所以我们要在先进文化环境营造上下功夫，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在文化引领、文化传播、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诸方而共同努力，形成良好氛围，比如目前的“文化礼堂”“最美活动”“红船文化活动”等，进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浙江人文传统的良性互动。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 社会学卷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409.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63—664.
- [3] 李春华. 文化的“化人”与思政的“育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9): 138—144.
- [4] 佩鲁. 新发展观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19.